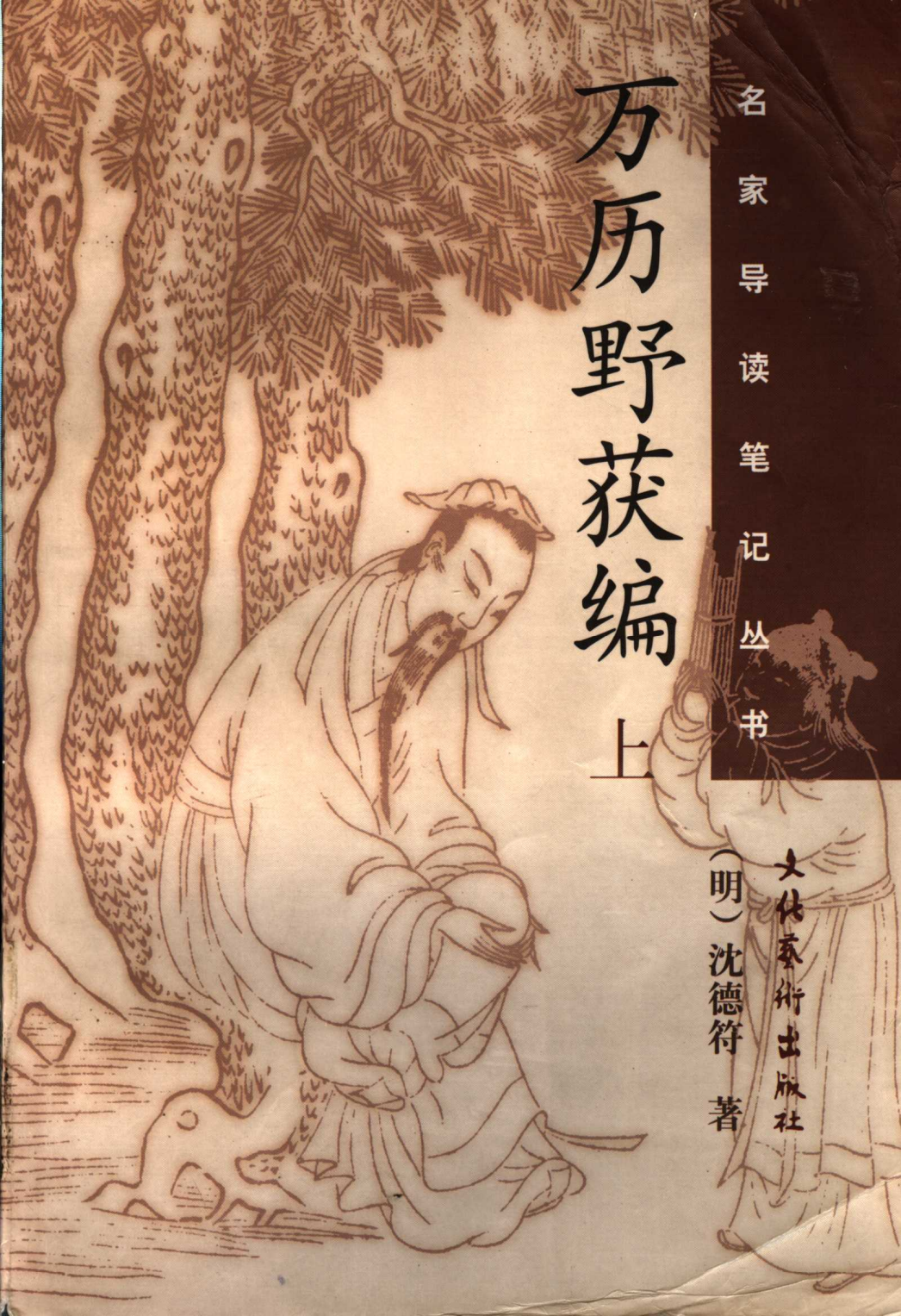


名家导读笔记丛书

万历野获编

上

（明）沈德符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万历野获编

上

(明) 沈德符 著

黎 欣 点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万历野获编

(全两册)

(明)沈德符 著

黎 欣 点校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3.25 字数:760,000

1998年6月北京第1版 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039-1794-6/I·783

定价:49.00元

总目

导读	(1)
万历野获编序	(17)
续编小引	(18)
补遗序	(19)
补遗跋	(20)
野获编分类凡例	(21)
目录	(1)
正文	(1)
校点后记	(1010)

“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者” ——沈德符与他的《万历野获编》

卜 键

大明帝国的车轮运行至神宗朱翊钧的万历一朝，已颇觉滞重进拽，内忧外患，国运暗淡，然却在此时进入其学术的黄金时代：哲学的勃郁，史传的繁荣，艺术的猥兴，共构成一时之盛。即以史学论列，正史、别史、谱牒、家乘，无不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越前此数朝。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一经问世，便引起学人的注目，被誉为明代野史之冠。

《万历野获编》多被列为笔记小说，实则其所提供的明代（尤其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间）史料，以作者特有的缜密与详赡，常可补正史之阙，校正史之失。治文治史，都可从这部书中广有取资。故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朱彝尊称此书“事有佐证，语无偏党，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者”^①。而《剑桥中国明代史》中也多处对其称赏有加，论曰：“作者的不带偏见和往往是非传统的看法，提高了这部作品的价值。”^②

《万历野获编》是治明史者当置之案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书。

一、沈德符的家世与生平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虎臣，浙江嘉兴府秀

水人。他留下了一部体系宏大的笔记杂录，关于自身的家世生平虽间或叙及，却记载无多，语亦欠详，同时代其他书中亦难寻觅。究其原因，当由于沈氏布衣终生，功名未就，在重科甲的当时便易被忽视和遗弃。所幸其生于仕宦之门，父祖辈皆由甲科入仕版，草蛇灰线，约略可迹。由其祖父沈启原行状中，可知德符祖籍汴梁，宋室南渡时播迁至会稽，明洪武间徙松江，再徙善乡，明宣德中善乡隶属嘉善，后又迁秀水之长溪村，遂定居。今辑其世系为^③：

- 始祖：庭芝（自会稽徙徙善乡）
- 二世：瑾（字子厚，赘居秀水长溪）
- 三世：瑀
- 四世：渊
- 五世：度
- 六世：復（号东园公，封徵事郎）
- 七世：谥（字靖夫，号石云公，进士，仕至湖广参议）
- 八世：启原（字道初，进士，仕至陕西关南道副使）
- 九世：自邠（字茂仁，进士，翰林院修撰）
- 十世：德符
- 十一世：克家
- ：
- ：
- 十五世：振

记载缺乏，我们不知道沈氏那位随宋室仓皇南渡的先辈之详细情况，然就秀水一支的“始祖”沈庭芝而言，已是纯粹的布衣力田者。秀水沈氏由耕而读，学而优则仕，沈谥为第一人，于振

兴家族功莫大焉。沈谧，字靖夫，号石溪、石山、石云，嘉靖七年戊子（1528）中乡试，次年己丑（1529）连捷进士，授行人，迁刑科给事中，历山东佥事、江西佥事，擢湖广参议，未赴而卒于乡，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④。

沈谧的时代适值“阳明学”传播渐盛，他也是一位热烈的王守仁的崇拜者，康熙《嘉兴府志·人物志·秀水》：

谧为诸生时即慨然慕道，一日读阳明《传习录》有悟，即拟渡江从之游，会阳明征思田不果。闻湛甘泉、薛中离讲学京师，遂就正之，相与阐性命旨。……尝建书院于文湖，祀阳明，湖在秀水县北四十里，与钱德洪、王畿、唐枢诸人往复切磋，学者翕然向风。

德符之生也晚，未能得见这位“内行醇笃”的曾祖，却必然呼吸领会到其在学术上的遗风，乡居间拣读其遗书，摭拾其故事，于日后的写作必大有助益。

德符的祖父沈启原亦由甲科入仕途，惟血性胆气似又过沈谧，留下许多佳话。康熙《秀水县志》记载了启原在倭寇肆虐时毅然捐千金助军饷之事，《国朝献征录》卷九十四更记其练兵抗倭事迹：

初徐海未擒，连岁剽掠嘉、湖、苏、松间。先生倩膂力贩徒，散以飞舸，日团聚长湖大溪中，躬指授进退之法，重偿其直，而诸贩徒亦自感奋。一日倭果操两巨舰由平望入乡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飞舸从傍夹击之，因迤逦北遁。

读之令人色飞！在倭寇猖狂、官军莫敢撓其锋的当时，沈启原率

轻舸击其巨舰，使之败逃，遂保一境之平安，功德亦宏。其时启原年未三十，胆略识见均为常人所不及。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沈启原举进士，为二甲第十七名，试政南京户部。关于其科第甲名颇有一些说法，其学生为他写的行状中谓：“廷对策文，词古雅，楷法工致，咸谓上第不忝。及发卷，阁部大臣果遣报一甲第三人矣，会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为选首，于法得北曹郎……”^⑤这些文字或有谀墓之嫌，亦可证启原的才华和家学渊源。

沈启原在宦程上跋涉了近二十年，于陕西按察司副使任上，因简慢而开罪于抚台被论劾，即自解任归乡。仕途风霜仍未磨洗去他的风骨与节操，归程中启原登山临水，歌咏吟哦，好不轻松自在。返乡后，沈启原日惟读书，治园林，摒绝与贵显者的交往，十五年间足不入城市，“所笃好唯图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籍，悉购无遗。或少缺略，借之储书家，务缮写完好乃已。”^⑥当沈湜之世，已在园第中建有“万书楼三楹”，启原蒐求渐广，积贮更博，便扩建藏书之舍，题名芳润楼，“净几明窗”，可推想这也应是沈德符在乡时读书和写作的地方。

启原之子、德符之父名自邠，年二十即中乡试，四年后举进士，又选为庶吉士，亦算少年俊杰。散馆后自邠入为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大明会典》，书成后迁修撰，给假省亲，荣归故里，不幸病逝，卒年三十六岁，士论惜之。康熙《秀水县志·人物志》称他“生而韶秀，嗜学，尽读百家所藏书，而好窥大旨，发为文章，清素冠冕，无险巇诘曲态。”自邠“为人恂恂雅饬，如冰清玉润，颇似其文”，他的风格，必然会影响到沈德符。

家庭和父、祖对沈德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以读书和著史最明显。酷爱藏书的祖父，任职于国史馆（翰林院）的父亲为沈德符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也提供了条件。沈德符在该书原序

中说：

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

首先强调的就是其家庭环境，是父亲和祖父的言传身教。

沈德符于万历六年（1578）出生在北京。前一年的春天，他的父亲沈自邠会试第八名，再以廷试二甲选为庶吉士，入馆读书。庶常馆向被称为储相之地，入馆者前程无限。自邠春风得意，又喜得第一子，带给沈氏家族极大欣喜。沈氏本家道殷富，至此已三代仕宦，家业资产更相扩展，自邠居京必无拮据之感，德符的童年谅也衣食丰足。而沈自邠由检讨与修《大明会典》，擢修撰，始终为翰林清素，耳濡目染，德符自幼年便喜闻朝野故事，记忆也必多。孰料天有不测之风云，自邠在壮岁遽然辞世，留下寡妇孤儿，京邸再难落居，只有举家南归。此年德符虚龄才十二岁。

在秀水乡间的沈德符，开始时当也是无忧无虑的。祖父沈启原仍健在，且于乡居十馀年间将园林修葺得颇见规模：“为堂有与闲、存石，为阁有紫芝、阆风，为斋有止观、徐于，为台有紫云、香雪，为亭有苍玉、点易……”^⑦其长期蒐求图书，亦见成效，“虽乐收藏，不拘拘宋元旧刻，唯求纸版精明。”德符为启原长孙，督孙读书，当是其暮岁之趣。这位不擅言辞的祖父讲到史传典故便话语滔滔——

平居呐呐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评鹭经史，如倒囊出物，愈出愈不可竭。^⑧

少年的沈德符，便是启原的忠实听众，或也是其品评朝政、闲话书史的对象。德符称“窃聆父祖绪言”，而父先祖后，次序分明，信乎不诬。惜乃祖启原也总比儿子多活了两年，便与爱孙作别，撒手西去。

沈德符一生追求的也是科举入仕，却再也没有了父祖的运气。由于出生在北京且入为国子监生，沈德符须参加顺天府乡试。其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写的小序，真切记录了他在又一次科试失败的感受：

困阨名场，梦寐京国。今年鼓篋游成均，不胜令威化鹤归来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几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还，舟车多暇，念年将及壮，遭迥无成……

成均又称成均监，亦即国子监。所谓“鼓篋”，即击鼓开篋，古时入学的一种仪式，是可知沈德符有入监就读的经历。其在《续编小引》中自述“少生京国，长游辟雍”，亦可为证。明季入国学之途甚多，德符当为贡监。其父原在翰林院，在国学中故旧必多，或能为助力。

这年德符已虚龄二十九岁，其入监的目的很明确，便是为了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其祖父启原、父亲自邵均在二十岁左右考中举人，而他遭受的却是一次又一次败北。序言不长，其以“鼓篋游成均”与“垂翅南还”相对写，更画出败落后的沮丧与茫然。据《明史·选举志》，秋闱例在八月举行。而德符的小序自题“仲冬日”写于家乡，文中语意显见回乡未久，是可知其在国学的日子并不长。明中叶，国子监生常四、五千众，有在监读书和拨历诸司等多类，而德符则在乡试落榜后即回到了秀水。其时国学监规日严，生员来去比先朝要自由自在一些。沈氏在京师旧有

宅第，但沈德符的常住地仍是家乡，故有“梦寐京国”之语。惟番番应试，舟车劳顿，又番番下第，委屈焦灼，黯然神伤，亦不啻一种精神折磨。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沈德符考中举人。这年他已满四十岁。次年应礼部会试，沈德符又名落孙山。后此直至辞世，德符执著地冲刺科举之路的最后大关，终也未能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他“年四十，始上春官，累举不得第而死”，充满同情和怜惜。据当时相知者的看法，沈德符天资聪慧，读书勤苦，闻见渊博，终其生未能一第的结局是有欠公平的。

就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初秋，亦即其挟乡试之锐再搏一第不逞后，沈德符回到秀水，重理旧稿，续编“野获”之书。这时的沈德符，虽说讲了一些“困处菰芦”、“藿食者”之类的话，却还不会完全熄灭搏取一第的热望。后此的二十馀年间，必还会有许多次进京赴试之行，那失败的滋味，其还会再再品尝。惜乎记载欠详，不能确知。

沈德符有弟名凤，字超宗，亦负隽才，擅书法，却不幸早卒。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尝曰：“自凤亡，余书法无可传。”^⑧爱重如此。德符独自承担家庭之责，孝养母亲，抚育侄儿（侄沈倩，字伯远，精书画鉴赏，与李日华交善），有“不附党援，孜孜以汲引后进为任”^⑨之誉。诗文有《清权堂集》。

明崇祯十五年，沈德符卒。未能遭受亡国的离乱之苦，算是这位有良知、有史识的布衣儒士的一种幸运。

二、《万历野获编》的成书、版本与流传

由沈德符写在本书卷首的序言可知，其编成此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部札记杂录式的作品，收集整理的是其

旧日闻见，写作则大约是集中进行的。书序之日，当是刚开始编辑撰写不久，故其在《续编小引》中说：

盖自丙午、丁未间，有《万历野获编》共卅卷，弃置废麓中，且辍笔已十馀年而往矣。

可证德符在丙午落第还乡后，集中了一段时间来写作《野获编》，拈出目录，釐为三十卷，或未能付梓。此后十馀年间，举业碌碌，德符未再动笔。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其应礼部试再失利后，沈德符又想起这部废弃久之的旧稿，操笔续录，曰：

壮岁已去，记性日颓。诸所见闻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旧贮，遗忘未尽，恐久而并未尽者失之，遂不问新旧，辄随意录写，亦复成帙。绪成前稿，名曰“续编”，仍冠以“万历”。

续编的写作时间远较前编为短，其分类和序次亦较随意。要之，《万历野获编》的写作都是沈德符在科试之途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一则入监读书后乡试失利，一则中举后会试落第，便以著作来平复心中的创痛。想象在叙说历朝典故、兴衰际遇之时，沈德符比照前事，也会找到一个心理平衡的支点吧。

沈德符卒于风雨飘摇的明崇祯十五年，生前没有看到《万历野获编》全帙的刊行。其后的岁月更是长期的不稳定：明清易代，南明诸帝的继起继亡，杭嘉湖一带的抗清和招致的凶蛮报复，给富庶的嘉兴地区带来了灾难，其五世孙沈振曰：

先高祖孝廉公撰《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又《续编》十

二卷，精核该博，凡朝常国典、山川人物，钜细毕举，惜未付梓。至崇祯末，长溪为萑苻之藪，流离播迁，累世琬琰，具已渐灭，是编所存仅十之四五。^①

萑苻，指盗贼。一段写出当日离乱播迁之苦和家族蒙受的损失。《万历野获编》能在战火中留存下来，虽说“仅十之四五”，已大不易。

沈德符的后人对该书的蒐求和流传起了重要作用，约在康熙初年，由其子、孙辈编校的一个钞本便出现。钞本由德符二子（过庭、克家）编，四孙（萼、英节、芾皇、维伦）校，曾孙奕云抄录，分上、中、下三编，共收入 80 馀则，卷首列《本传》，系迳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文字而略加增饰，次为沈德符《小引》，与现行本文字亦稍出入。这显然是一个简本。

然则《万历野获编》本、续两编皆以万历年间著成，当时便可能有人借观或传抄。由于沈氏的生活和游历所限，钞本在嘉兴和京师流传的可能性较大，而蒐求者有当世大儒，也有乡间饱学之士，首先是清初两大儒钱谦益与朱彝尊。钱氏对《万历野获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显然是收存且详读过该书。因其先罹难入狱，家中素以藏书著称的绛云楼又于顺治七年（1615）毁于火，是编必也同化为灰烬。

朱彝尊与沈德符同里，为秀水梅里人，其在乡里即留意沈氏遗编。康熙十八年（1679）朱氏举博学鸿词科，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纂修《明史》。德符书中详明富赡的明代史料，必为修史者所关注，故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归里，更是加意访求辑录，后渐具规模。在《万历野获编》的流传史上，朱氏功不可没。

另一位有心人，是距秀水不远的桐乡人钱枋。钱氏身世欠

详，大约亦一饱学且多资的乡间儒士。其自朱彝尊处借钞《万历野获编》原稿，“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因割裂排缣，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这个重新整理后的本子，便是今日常见的通行本。

德符的一位五世孙沈振，亦一位有心人。其一面做私塾先生，一面据幸存的目录，致力于访求《万历野获编》佚稿，对照钱氏刻本所缺，又抄附二百多条，编为“补遗”，原为八卷，后被整合为四卷。

以版本论之，《万历野获编》有钞本和刻本两个系统。今知较重要的钞本有：

①明末大字本《分类野获编摘录》钞本，五册。抄者有“前编续编已载者不录”题记，显然是一个抄补本。

②沈过庭等编校、沈奕云抄录本。分为上、中、下三编，六册一函，约抄成于清康熙初年。

③朱彝尊家藏本，不分类，约抄成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后，缺略仍多。

④钱枋家藏本，自秀水朱氏藏本过录为“列门分部，事以类序”，为三十卷本。

⑤沈振辑补本，以桐乡钱氏藏本为基础，加“补遗”八卷一百三十余条，约抄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刻本系统，今知者如下：

①明大字本《分类野获编摘录》，略为四十四类，共收录四百六十六条，因遭清朝禁毁，世不多见。

②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桐乡钱枋活字印本，分为四十八门。未见。

③清道光七年（1827）钱塘姚祖恩扶荔山房刻本，首图所藏为二十四册一夹，题“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卷首有：沈德

符《万历野获编序》，钱枋《野获编分类凡例》，和“道光七年岁次丁亥春三月钱塘姚祖恩笏园氏识于羊城邸寓之扶荔山房”的《校刊野获编弁言》。

④清同治八年（1869）姚祖恩子德恒重校刊补扶荔山房本，卷首序次略变，为：姚祖恩“弁言”，沈德符原序，总目，卷一子目，钱枋“凡例”。

《万历野获编》在流传史上真称有幸有不幸：先经战乱，又遭禁火，是其不幸；而迭经险厄后能流传下来，子孙珍惜，儒林爱重，散而复聚，禁而不绝，是其大幸！除却其嫡系子孙，秀水朱氏、桐乡钱氏、钱塘姚氏均为该书流传作了贡献。然辗转传钞、据目觅补，“旁考群书”，“割裂排缀”，整理过录的过程也带来了较复杂的版本问题。仅就卷数之一端就有种种说法：

沈德符《续编小引》称原编为三十卷，未言“续编”卷数；

钱枋“凡例”称重新编排为三十卷、四十八门；

德符五世孙沈振谓：“先高祖孝廉公撰《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又《续编》十二卷。”又称其以“钱本为主”，抄补“二百三十馀条，作为八卷，复校原目，一无所遗”；

姚氏刻本出，则为“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并在《弁言》中说：“旧时佚失诸条，仍存其目以待续补。”

金忠淳《砚云甲编·顾曲杂言》跋语又称：“《野获编》凡三十二卷。”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且沈氏《万历野获编》又有以分类单本流传的特点：如主要论戏曲的《顾曲杂言》，即见之于第二十五卷“词曲门”。另如《秦玺始末》、《飞鬼语略》、《敝帚斋馀谈》、《敝帚轩剩语》等等，均从本编中摘出，可证该书之受识者爱重。

三、沈氏的史识与史笔

明代中晚期尤其是万历以降，除官家修史外，私史或曰野史大行，略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涌幢小品》、焦竑《国朝献征录》、于慎行《谷山笔尘》等，体式纷纭，侧重各异，共成一时之盛。沈氏《万历野获编》之标标特出，首先在于其史识与史笔。

冷静的史家眼光与批判意识

沈德符为明朝子民，所著书自不免颂圣之词，然仅限于颂赞其圣明之举，对大明历代皇帝的失误和品性弱点，其在书中也多的指摘，褒贬并存。

如其论太祖朱元璋时颇多赞语，然一则《李善长》录洪武二十六年之诏，其凶残擅杀即跃然纸上，虽开国功臣亦不恤也。如记成祖夺位和入南京太庙伏地大哭之复杂心态，以及哭祭毕对建文诸臣的拷掠籍没，亦入木三分。其他如写宣宗，兼写其平和与庸弱；写英宗，详绘其被掳失位之苦与复位后诛害忠良于谦；写景泰帝，着意于其临危受命监国的英主气概及留恋皇位酿成的祸变；写宪宗，既见其宽厚（对叔父景泰帝）又见其宽纵（对万贵妃及家人）；写孝宗，则叙其寻母家之痴情和容忍外戚为恶之麻木……作者运笔简洁明快，事无论巨细，数语即画出其颊上三毛，形象尽出。

该书的重点又在正、嘉、隆、万四朝，对其间朝政纲纪、内阁部院、外藩内宦、海防边事均有涉及，也都能指出其弊端，予以评说。尤重在对一些军国大事的记载和品题，如正德朝的巡幸

和豹房、嘉靖朝的“议大礼”和“李福达之狱”、隆庆朝的内阁倾轧、万历朝的“夺情”风波。沈德符虽名其书为“野获”，实则始终关注的仍是宫廷和宦场，以朝阁的重大事件为轴，带写出各色人等，颂忠扬善，斥奸骂邪，又能曲尽忠臣义士之褊急偏狭，救正与逢迎之掺杂交织，曲尽权臣之晚途凄凉，奸宦之悲惨下场，是一部宦情书，亦是一部警示录。

史料详赡与持论中正

沈德符之作分类详明，收罗弘富，俨然一部史传格范。且其以时人记时事或追记前朝，倚傍和采择均较后世为便。同时如王世贞“四部稿”，以当朝大吏论朝事，难免以个人好恶断之；而焦弱侯“献征录”则辑集墓志、行状，更多谀墓之词。惟沈氏不然，其未入官场，始终以士子之眼注视着闹攘攘的朝班，持论能平允公正。

如影响嘉靖朝的“大礼议”，由世宗追尊本生的一点孝心，竟发展到内阁对皇帝的抗争，发展到翰林与科道的联章论谏，发展到欲在廷参时击毙持不同意见的张、桂二人，发展到左顺门的撼门大哭和群跪示威，终酿成廷杖和流放，酿成臣僚间的数十年的不解深仇。德符在详述这一事件时既写出世宗的少年固执，又写出首辅杨廷和对新君的轻视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写出这场政治悲剧的种种先兆和余绪，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然更多的，作者则通过这一事件写出了一代君臣的猥杂与拘泥：方正德帝遽亡，新帝以藩封入主大内，即位诏除旧布新、百废待兴之时，却因一帝家私事争执无休，各行极端，是何谬也！内阁不职国事，翰林不修国史，科道不争国本，将帅不务边防，都热衷于令孝思甚重的小皇帝称父母为叔婶，至不惜抛头洒血，